

长篇全景式辛亥革命纪实之作

世纪之门

1

马昭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men

世纪之门

马昭 著

人民出版社



马昭，一级作家，中国作协会员、吉林作协理事。

1940年7月15日生于吉林市。1962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历史小说创作时即另辟一径，以《醉卧长安》揭开了描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页，随后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草堂春秋》、《浪荡子》、《真男子》，对于探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境界、心灵历程、文化政治作用，揭示其历史命运作了成功的尝试。此外，还有《明代历史故事》、《外交用兵》两部专著以及《李白传》、《杜甫传》，都富有创新的内涵。至今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纪实文学、传记7部、历史研究专著2部，计五百余万字。

马昭是我国历史小说创作领域中独树一帜、独见地、独有特点的严肃作家。有人称之为有鲁迅先生的不媚俗、不阿世、不顺风之风骨。

给现代人和后人留下一点可供咀嚼和玩味的文字，作为清醒剂，是其追求的目标。

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0 年献辞

就历史而言，暴力只能阐释一时胜负、或贼或荣，经济则关系时代繁富，而决定一个民族兴衰命运，长久起作用的毫无疑问是文化。

匈奴、鲜卑、氐、羌、羯、巴、沙陀、契丹、金、蒙、满，都曾以其尚武雄姿，跨越长城，侵占汉土，部分或全部攘有汉家河山。可在瑰伟绚丽的汉文化面前，却一个个趋于认同，陷入被同化的轮回，成为被“异族文化异化的民族”，丧失了其原有的部族面貌、生力、种性基因与族属特点，有的则归于消亡。

所以，只有文化才拥有永久魅力，在文化面前任何强力只能是哀叹的侏儒。

——代前言：写给 20 世纪、献给 21 世纪的扛鼎之作 □

代前言

写给 20 世纪 献给 21 世纪的 扛鼎之作

刘存沛

20 世纪行将走完它轰轰烈烈的百年路程，一个“更高、更快、更强”的新世纪的曙光已在前头。我们有幸站在世纪的交汇点上。

世纪之末，回眸百年，抚今追昔：这是一个荆棘丛生，路途坎坷，风雨阴晴频仍，苦难与光荣同在的百年。

世纪之末，回眸百年，继往开来：这是中国人告别血与火、哀与痛、贫与弱，从饥寒交迫走向温饱和小康，奔向富强民主文明的百年。

世纪之末，确实是一个最让人生发世纪情结的大季节。这不，远在大东北的历史小说作家马昭，千里迢迢，情有独钟，给远在大西南搞文学出版的我们，挂号寄来了他满怀世纪情结

的扛鼎之作——《世纪之门》的打印稿及其软盘，还有让人不胜苍凉之感的一些历史图片。在我们作出出版《世纪之门》的决定以后，他又再三希望我们给他写个序言。我们说不，这么个耗时五年写就的、洋洋一百二十余万言的大作，还是请名家写序最好。马昭也说不，说谁也不可能像责任编辑那样熟悉书稿、舍得在书稿上反反复复、出入来去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盛情终于难却，有道是，该出手时就出手，于是有了这篇读后感，充其量算做代前言。因非名家之序，读者诸君可不必在此停留，可径直跳到故事中去。因为，这毕竟是一部很有看头的作品。

读罢《世纪之门》，虽不说使人产生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超级感受，但确能给人一种大江东去的感受，一种大气磅礴的冲击。确也教人百感交集，欷歔不已，思绪万端。作品写的是辛亥的大事和大势，这是伟大的 20 世纪初叶发生在中国的伟大事件。它直接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也影响着现代中国。一位伟人在近六十年前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帮助的。”

另一位伟人在难忘的 1997 年指出，辛亥革命“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孙中山领导的。他首先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我认为，《世纪之门》的创作主旨和体现出来的精神内涵，正

好明符和暗合了这两位伟人的观点。只不过，伟人们作的是高度抽象的概括，高屋建瓴；而作家则运用丰富的史料，剪裁成艺术性的画面来说话，形象而生动。也就是说，《世纪之门》是用形象化的手法，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进步和局限、先进和落后，以及错误、失误等等，让我们面对这份历史遗产时，有一种鲜明生动的启示和感受。包括那种既给人生命快活、发出会心的微笑，又使人心为之一再沉降，慨叹人生、人性困惑的感受。因此可以说，《世纪之门》是一部写给 20 世纪的长篇新著。

《世纪之门》还是一部献给 21 世纪的长篇新著。21 世纪将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中华民族无疑将在 21 世纪的世界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世纪之交的关头，处理好自己的事对扮演好这个角色十分重要。而处理好自己的事中，借鉴近代中国人推开 20 世纪之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是一个重要方面，它将有助于现代中国人推开 21 世纪之门。可以说，在这方面，《世纪之门》发挥了重要的功能：它更为直接地参与了对本世纪初叶中国整体社会的考察与纪实工作，参与对领袖和将领，对精英和民众，对人生、政治、军事、历史和文化的探讨与反思。而这种探讨和反思，是辛亥的诸多人物和事件在历经从世纪初到世纪末的百年风雨洗涤、尘埃落定之后的当今进行的，因而具有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有着活泼的生命力。也就是说，世纪初的中国人可以使世纪末的中国人拥有一个高起点而高瞻远瞩；可以给我们的参照系增加一个新的储备，以利彰往察来；可以让我们通过对世纪初整个中国社会的鉴、势、理、道的理解、领悟和体察，提高聪明才智，在迎接新时代的挑战中，多一些进退裕如的底气。由此，我认为，《世纪之门》对辛亥大事和大势的领悟、体察及其鉴、势、理、道主要有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作家一方面满怀激情地写了辛亥革命党人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写了这种“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的精神力量，表现了孙中山先生席不及暖为国家进步、民族复兴而毕生奔走呼号，四海筹集资金，亲手创建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壮举；表现了革命将领黄兴亲临战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的拼搏气概；表现了武昌首义热血青年们勇洒热血、视死如归以及革命党人舍身除凶顽的果敢行动；表现了世纪初中国的思想文化精英们殚精竭虑，利用自己的笔，利用先潮的思想启发民众的聪明之举等等；而另一方面，作家冷静客观地写了在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和诸多革命举措后面露出的浮躁和盲目，显现出领导层整体素质不高，不是缺谋少略、无自知之明亦无知人之明，就是每谋不成、每战不胜仍自以为是，包括诸多在今人看来简直形同儿戏的处事和决断的难堪，不得不叫人叹息：这就是既高明又不高明的世纪初中国人啊！接下来会追问：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到底比世纪初的中国人高明多少？有哪些心智不同？又有哪些秉性相同？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扬弃？等等。

二是作家怀着对革命党领袖人物、对革命党人中的思想家、社会活动家、笔杆子、学者们的深深敬意，写出了革命党大造革命舆论以争取民心、震慑清廷的举措，同时揭示出在这种有意制造革命舆论之后的无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问题。《世纪之门》让我们看到，世纪初，卷入革命浪潮的人们，除了革命党人外，叱咤风云的，就是各省的都督、领军人物，而普通民众除掉一次次欢呼革命军的胜利、做些犒劳之举外，更多扮演的是羔羊的角色。问题出在哪儿？先进的理论（包括口号）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千万人自觉的革命行动。这

是现代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而世纪初提出过的那些革命口号，就连在清廷中供职的良弼和在北洋集团中率兵的“士官三杰”等这些有进步思想、善于思辩的人都看出了问题，都看出其中难以自圆其说的破绽。从这里，我们可以领悟到一个史鉴，即一套理论的形成、一个口号的提出，能否行得远、走得实，全在于要符合实际、符合国情，否则，不能真正武装群众。联想到当今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是在一整套成熟理论的指导下奔向 21 世纪，比世纪初的中国人明白多了，有力多了，也幸运多了。这是辛亥革命党人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三是团结问题，也就是涉及到民族性的“窝里斗”的问题。《世纪之门》本着历史无所忌讳的精神，在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将革命党的问题原原本本的展示给读者，引导读者思索。它让我们看到，世纪初，在复杂纷繁的历史环境中，革命党人们竟然一天也没有紧密团结过！（在世纪初的几大政治势力中，唯北洋集团相对稳定和团结一些。）先是在武昌起事时，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市宣讲革命，黄兴在香港同盟会总部，宋教仁在上海，陶成章在南洋，章太炎在日本，康有为、梁启超在东京。接下来我们看到，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组合为同盟会后，表面统一了，其实，除在推翻清朝上是一致的而外，内部仍各立门户，派别重重，真所谓“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后又发生了同盟会、光复会的分裂。再就是陶成章被暗杀，导致光复会瓦解；宋教仁被刺死，华兴会便走向衰微。在与袁世凯的抗争中，同盟会三巨头也只有宋教仁承担起责任。而在汉口、汉阳的争战中，面对强敌，面对不利形势，革命军内部的重重矛盾依然不能化解，文学社和共进会、旧军官和新将领、立宪派与革命党、湖北军人和黄兴带来的指挥中心，种种意见和积怨都在汉口、汉阳失守、黄

兴下令枪决临阵办婚礼的杨选青之后爆发了。接下来，是张振武、方维两颗明星的死于非命，林述庆、黎天才两位良将的终不得好结果，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从《世纪之门》对这一系列史实的描述中，我们又一次认识到，团结对一个革命党、对一项革命事业的至关重要。真是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有力量。在走向21世纪的征途中，那种“窝里斗”的民族劣根性当应不断地扬弃，我们民族将大有希望。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四是腐败和贪贿问题。这可能是一种“世纪病”了。读过《世纪之门》，我们会惊叹，腐败和贪贿，不是现代中国官场的新生物，早在世纪初的革命党人中就滋生蔓延了。孔方兄对世纪初的中国官人，是一视同仁的，不论是对清廷一方，还是对袁世凯一方，不论是对康梁诸公，还是对革命党人、革命军官，以及对国会议员，都能相机附身。袁世凯就深谙此道，知道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小妾、婢女、杀手、田庄、房产、官位、选票等等。因此他能大把地花钱，收买清廷的重臣，收买议员，收买死党，用钱铺路夺权。吴禄贞的脑袋不就是被用钱买掉的吗，割下他脑袋的就是他的卫队长。试想，他要是不能被买掉脑袋，率兵打入北京，格局又将怎样改写？黎元洪从协统成为都督，从都督变成副总统，其“革命”经历仅仅一年，却已成为家资百万的新暴发大户。而革命党人向海外爱国华侨募捐，从中吃回扣的事也不少见。在后来的国民革命政府中，此等贪和贿的问题，也不是很干净。话说到这里，并非是主张革命者都对孔方兄来个敬鬼神而远之。而是说，对革命事业来讲，孔方兄确实起着一种“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作用。关键是谁能很好的驾驭它。本世纪40年代，一位伟人就说过，节约每个铜板，为着革命和战争的需要。革命、战争、建设都

需要钱，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世纪之门》让我们生出这样的惆怅，要是当年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时，不单只带来革命精神，还带来众人翘首以盼的一大笔巨资的话，那么，辛亥的历史又该怎样演变、推进？

五是改革和建设的问题。《世纪之门》写出了辛亥革命“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的历史事实，这是尤为值得肯定的方面。它反映了孙中山对外开放的思想，比如关于借外国资本、用外国人才的主张，关于在全中国修建二十万里铁路的抱负，关于购买外国飞机、大炮和兵舰以武装革命的计划等，说明改革开放的思想，在本世纪初中国先进人物观念中也已经初步产生了，只不过，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还不能和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放得在一个档次上。与此相关的另一面，即世纪初叶民族精英们对外开放的观念中，就有不少误区，《世纪之门》如实写到了。比如，对东西方两个世界的认识上，就有些离谱。就日本讲，近代中国人对其了解、把握实际上是很有限的，他们往往忘记了日本在中国获取的利益可是最多的这一历史。就战争赔款讲，1874年的琉球事件赔款、甲午战后赔款、庚子赔款等，总计近代中国对日本历次战争赔款折合银元70232万元，在所有对中国发动过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从中国获得的最多。民初的中国人却只讲中日“同文同种”、“文化同宗”等，完全陷入了一种认识的误区。就对西方列强美、英、法讲，也不切实际地抱有幻想，寄希望于三国政府会帮助中国革命。共和草创之初，又机械地效仿西方民主，搞众议院、参议院、立法院，无视中国国情，尝试三权分立，终以失败告终。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认识价值。

六是对战争的理性思考。《世纪之门》用了相当多的史料和相当大的篇幅，来叙说从辛亥起到民国建立间的战争，对惨

烈的多起战争场面作了具体的描写和评说，给人以强烈的感受，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国情、民情、认识历史很有用处。值得肯定的是，这些描写和评说，均与历史的真实相吻合。说到这里，让我摘要一篇而今已届九十四岁高龄的舒同先生写于七十多年前的《中华民国之真面目》的段落（全文载于1997年11月29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供读者参照《世纪之门》阅读，将有所裨益。这位当年仅二十岁的舒同先生写道：

“自改革以还，战争迭起，杀伐相寻，弹林枪雨，狼烟瘴气，暴骨如莽，积屍成山，南北之畛域既明，党派之争尤烈，共和政体固是乎？！数载以来，专尚纷争，只有强权并无公理，强者存而弱者灭，大盗胜而小盗亡，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不啻为今日之道也。而其治下之严峻，徵收之横暴，尤为痛苦难堪，平等国家固是乎？！战争既剧，流毒靡穷，非特有帛被剥，有粟被夺，而大军所及，十室九虚，至其惨无人理之行为，虽以主持公道之报章，犹不敢遽加直笔，自由主义固如是乎？！嗟嗟满清退位，民国成立，人人倾心欢声遍野，以为此后共和之可成，平等可冀，自由可得，孰意迄至于今，国家之争乱如故，政体之专横如故，民之束缚如故，共和安在乎？！平等安在乎？！自由安在乎？！然则所谓共和者名焉而已，所谓平等者名焉而已，所谓自由者名焉而已，即所谓中华民国者，亦不过名焉而已耳。”接下来，舒同先生在文中与友人展开了一场观点交锋的论战之后，继续写道：“余之所以恶民国者，非恶民国之不善，恶其不能实践民国之宗旨耳。向使我国早息兵戈，无分南北，合五大民族而为国，并四万万同胞而为治，居上者以惠下为怀，为民者以爱国存心，选贤任能，去邪除奸，则真正之共和可得，真正之平等可至，真正之自由可期，而中华民国之真正精神，亦在是矣。若此岂不熙熙然为亚洲第

一大文明共和之国家也哉?!”舒同先生最后叹道：“第此兴盛之时期，不知经若干年后始可得而实现。”无须说，耄耋之年的舒同先生早就亲眼得见了“第此兴盛时期”的到来。

需要指出的是，《世纪之门》与舒同先生这篇《中华民国之真面目》虽然两者成文相距 70 余年，但都殊途同归，殊时同归，即都写出了“辛亥革命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命运”这一历史事实。由此使我想到社会的进步并不一定带来幸福或者说不一定给当时的人们带来幸福这个话题，继而又想到两位生活在与辛亥同期经历过一战的外国作家茨威格和罗曼·罗兰，他们分别是两个交战国的伟大作家，却能走到一起，联合反战。罗曼·罗兰呼吁人们要保持警惕，他指出，煽起仇恨的人“在他们背后还隐藏着物质利益”。茨威格亲眼目睹了战争初起时人们的亢奋状态后，写道：“说实在的话，我今天不得不承认，在群众最初爆发出来的情绪中确有一些崇高的、吸引的地方，甚至有使人难以摆脱的诱人之处……”这种诱人之处在于战争这类突发的历史事件使不少人感到建功立业不仅“可望”而且“可即”，使“普通人”开始成批成打地成为“英雄”，使一大批原来不知名的“小人物”突然成为令众人瞩目的叱咤风云之人。但茨威格并没有在这个层面上停止思索，他很快意识到“那种可怕的、几乎难以用言词形容的、使千百万人忘乎所以的情绪，霎时间为我们那个时代的最大犯罪行为起了推波助澜、如虎添翼的作用”。为此，茨威格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勇气起而反战，他写道：“我知道我要反对的敌人——那种把他人置于痛苦与死亡的错误的英雄主义；那种丧失良知的预言家们的廉价的乐观主义”。茨威格为何有那么大的勇气，为何那么清醒？就在于他恪守住“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

读一读茨威格的这些话，再读一读《世纪之门》对战争的描写，特别是那种“宁为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民众感叹，就会体悟到他们之间的心灵是多么的相通，他们的良知感受是多么相似，这可能就是作家之间的通感吧。这种通感明确地表达了对血腥暴力和专制迷信的深刻思索与批判，饱含着驱除黑暗、鞭笞愚昧、痛斥落后的悲愤激情，以及竭力唤起人们的理性、良知、人性和判断力、改善生存状态、强化民族整体文化素质的强烈愿望。今天，我们世纪末的中国人，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纪主题下向 21 世纪前进，回顾这个世纪中国人从苦难与光荣中走过来的历史，我们该是多么感慨！这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还值得一提的是，《世纪之门》作为包容性很强的历史纪实作品，对本世纪初中国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些细小事物，也随笔带出，略加述说，更增添了作品的真实、历史的真实，同时也给读者增加一种历史知识和趣味。如对武昌革命军在街头给群众剪辫子的描写。这种事在今人看来，会有一种历史的滑稽感、无奈感、幼稚感，当年可是作为一件革命大事来抓的。本世纪历史上，我们中国人以革命的名义在头发上作文章就两次，一次是辛亥，一次是“文革”，相隔仅半个世纪，你能说历史的进程是快了还是慢了？作品还写到了几起属于本世纪初叶的“首创”，如身居庙堂的大人物在国外银行存款，原来是伴随着民国就出现了，而不是现代才有；又如，开大会改一人上台主讲为设主席台让众官员上台陪座亮相，以示威仪和团结一致的中国式会例，当属辛亥革命军首创；再如，处决犯人前后，在布告宣传栏中出示犯人画像，也属世纪初叶的湖广总督首创，等等。审视和寻味对这些历史缝隙中小事、小节的描写，同对大事件大风云的描写一样，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文化的觉醒

和现代人格的建立。这又是《世纪之门》给我们的又一启示。

接下来，我要简略地谈一谈《世纪之门》对人物的把握和描写方面的几个特点：

一是注意凸现历史群体，塑造群雕式的人物形象，从而表现广阔的、多层次的、光怪陆离的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生活面貌。作品写了大大小小百十余个人物，从清官小皇帝、朝廷重臣到太监，从总统到平民，从将军到士卒，从各省都督到文化精英，以及洋人、外交官，还有马弁、仆人、丫环、使女各色人等，都有描写。通过各种人物的活动，使读者看到世纪初叶中国人各种各样的人生：磅礴的人生、动荡的人生、传奇的人生、痛苦的人生、滞涩的人生、昏聩的人生、浑噩的人生、恣睢的人生等等，从中获得一种生活的体味和生命的体验，从而丰富自己。

二是注重写人物的复杂性，使人物显出深刻的历史烙印，突出了个性。这种人物的复杂性是由历史的复杂性决定的。辛亥的历史复杂性正像本书所描写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进化与前所未有的社会斗争交相舛错，大大小小的宗派、团体、组织伴随着野鸡司令、草头将军等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不同利益的群体托身于同一个社会构架中，各自放手搏斗，在踢打之中不停地扯散这个社会构架。一方面是，整个上层社会处于紧张和分裂状态，庙堂之内，风雨飘摇，官官相斗之间往往没有善恶而只有利害；另一方面是，下层社会有着日积月深的苦痛和怨怒；再一方面是，新知识群体、知识分子中部分富有活力的人们越来越急切地呼应革命，而革命党人中，也是派别多起，新旧杂陈。这一切历史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物的复杂性。所以作品写到的人物都没有那种平面涂抹的感觉，没有脸谱化的感受，一般都显得实在、饱满和生动。所谓朝秦暮楚、婊子与牌

坊并立、白脸和红脸同构一类的人物，在作品中多的是。

三是平等公正地对待历史人物，不搞完人式的认识模式，无论对时代伟人还是对元凶大猾，都不卑不亢地写来。比如对孙中山的描写，作品在凸现他率众推翻清朝、亲手创建亚洲第一民主共和国的巨大勋绩的前提下，写了他深孚众望但在许多关键时刻又经常历史性“缺席”，徒令众人空盼；胸怀韬略而又经常靠过时的信息作出判断；谋有所出但不是那么游刃有余；日理万机却又那么会追逐爱情、拥抱生活等等。作品还写了同时代人、革命党人、清廷重臣以及袁世凯对他的臧否，同时，也写了党人热烈欢迎他归国的情景和万众争相一睹领袖风采的场面等等，这种完整的形象在同类作品中很少读到，这是很有认识价值的。又如对袁世凯的描写，作者也不用那种“白发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悠闲方式，也不随兴调侃，不用漫画化的手法，这就是一种尊重历史的负责态度。作品对袁世凯的方方面面写了很多，写得很是平稳，文字很有张力，其情节很耐人寻味，如写到他对待章太炎的态度，在左右幕僚皆曰章太炎可杀之时，袁止住了，说是要为中国保留一颗读书的种子，保留一个学人，中国就是因为读书人太少，才把许多事弄乱了云云。此等识见，任凭怎么说，客观上讲，确是难能可贵的。

四是以文化的眼光写人，使人物的气质、秉性活脱脱呈现出来。如对章太炎、王闿运、杨度这一类学者型人物的描写，其历史文化信息的含量很充实，人物精神风貌和思辨能力、言语中饱含的机锋，都给人阅读的快感、丰富感。又如对“士官三杰”的描写，于报国之志、忧国忧民的大同中，又分别写出了性格气质上的各各不同：吴禄贞的热烈而沉猛、刚鸷而机敏；张绍曾的运筹帷幄，不可拂逆、常使人不辩而屈的大气；